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专栏

创作谈

朝颜，原名钟秀华，江西瑞金人，侗族，1980年生，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9届高研班学员，现供职于瑞金文学艺术院。在《散文》《美文》《青年文学》《芒种》《西部》《百花洲》《散文选刊》《文艺报》等刊发表作品百万余字。获《民族文学》年度散文奖、三毛散文奖、孙犁散文奖、井冈山文学奖、香港青年文学奖等奖项，作品入选《21世纪散文年选》《中国随笔精选》《中国年度散文》等选本。出版散文集《天空下的麦莱岭》。散文集《陪审员手记》入选“2018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

我担任了五年的人民陪审员，其间，写作这部长篇散文的念头像一粒生命力极其旺盛的种子，扎下根来，枝叶不断生长，一天一天的，在我的心上拱动着，有时候是难耐的奇痒，有时候是怎么也捂不住的疼痛。我无法忽略它的存在，除了把它写出来，别无它法。五年来，我不断地出入于庭审现场，接触到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和案件，有醉酒打架持刀杀人的，有赌博负债挪用公款，有经济纠纷对簿公堂的，有感情不睦诉讼离婚的……这当中，有的生计陷入困境，有的妻离子散，有的家破人亡，有的兄弟反目。

那些充满着悬念的庭审过程，总是令我心怀期待。那是一幕幕真实上演的人间戏剧啊，没有彩排，演员们不需要专业的演技，却常常将剧情推动得惊心动魄。我带着一种自感羞愧的看客心理，不动声色地观察着这一切。冲突越尖锐，旁逸斜出的细节越多，对我越有吸引力。每次坐上那张位于审判台的高背椅子，我都要摊开笔记本，然后刷刷地作着记录。自然，这些记录与书记员的工作迥然不同。

我记下当事人的喜怒哀乐，有冷静平和，淡然处之的，有情绪激动、拍案叫骂的，也有悲愤难抑、泣不成声的。我记下旁听亲友的万千姿态，静观事态者有之，窃窃私语者有之，忍不住高声嚷叫者亦有之。这无疑是一个微缩的战场，可谓人生百态，尽在利益纷争中。因为一场官司的胜败，或者关乎人的生活保障，或者关乎家庭的出路和走向，或者关乎企业的生死存亡，或者关乎人格的清白尊严。他们难免不计较于分毫，难免在暗中较力，并体会到百味杂陈。

每一次庭审的背后，都生长着这样那样的故事。故事广

从破碎和疼痛中寻找余温

朝颜

我知道，我幸运地拥有了一整个园子的好菜蔬。但是如何择取其中的茎叶或根须，将之做成色香味俱全的菜肴，端上桌面，其难度又何其大也。我国的《人民陪审员法》是在2018年4月27日颁布施行的，而相关司法解释2019年5月1日起方才施行。这就意味着，作为第一批被聘用的人民陪审员，这几年我们都处在摸索和探寻的阶段。尤其在写作上，我不仅没有前人的范式可以借鉴，还需要开创性地量身订制一份全新的菜谱。

我艰难地择定了10种食材：借贷、租赁、婚姻、房产、土地、医患和消费服务等民事纠纷，职务犯罪、交通肇事、打架斗殴等刑事案件，我将它们排列在盘子里，10个典型的案例，将要制成10种滋味各异的菜肴。每完成其中一个，我都要翻阅大量的相关材料，并思考良久：文字的触须要伸出多长多远，伸往哪一个方向，它们触及的广度和深度在何处，意义是什么？我要做的，是文学对现实的又一次审判，以及对人性和人世的拷问与解构。

文字的命运，最终要由读者来完成。现在，我将这10个菜肴端上来，至于它们是辛辣、苦涩、酸楚还是微甜，它们会给人带来味觉上的适与不适，已经不是我能把握的事情了。



娜仁高娃

娜仁高娃，蒙古族，1980年出生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库布其沙漠腹地。2008年开始创作，蒙古语、汉语双语创作长篇小说《影》入选内蒙古草原文学重点项目；短篇小说《醉阳》《热恋中的巴岱》荣登2016年度中国小说协会排行榜，并获2018《草原》文学奖、十二届索龙嘎奖。中短篇小说集《七角羊》入选“2018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

每当从小城回到老家，感觉就像是灯光晕眩的酒吧，躲进了幽静的地下酒窖。我的老家在鄂尔多斯高原西北，库布其沙漠南沿一片原野地腹内。我习惯用“原野地腹内”几个字来圈住家乡。今年入夏后，老家有了电网。柏油路也刚刚从老家十五里之外修通，过去回家的路都是七拧八拐的土路。

那里什么都在变，周围的邻居都住土坯房了，各家有了汽车。父亲栽的树死了一些，草场上的湍尔（小湖）近10年不生水，羊群里没有一只是我认识的，还有，我们各家都添了一坟。当然，草是一年复一年地绿，风也是一年复一年地舞。原封不动的是屋后的柴垛、老井。还有，邻居弟兄三个光棍，黑脸马夫、牧羊人七斤，他们好似没怎么变。

老井在，当年挑水走出来的小径却早已不见踪影。老井北侧土坡覆着石头，有拳头大的牛舌石，有驼粪蛋大的黑石，有羊脑形状的鹅卵石，还有爬满斑点的蛙石。这些石头名字都是小时候自作主张给取的，不费力，就像是扭自己的耳朵鼻子。

给石头取名不费力，给羊群取名也不费力。光依着羊角形状取的名字，就能拉出一串：叉角、八字角、螺旋角、顺风角、萝卜角、剑角、镰刀角、钝角、马蹄角。当初，这些都用蒙古语来唤，我在这里做了意译。

它们构筑了我的童年世界。如果说，一个人的童年有边界，对于我来讲，偏僻原野地一隅，就是我最初的地盘。地盘不大，方圆几里地。如果硬要说，人从小总得有个遐想，那么天上的云以及长辈们言语中的长生天，就是了。

从幼年有记忆到7岁，我见过的人一定不足几十人，还没

一隅幽静地弥漫酒香

娜仁高娃

我家羊群多。后来读书离开老家，一路扩大地盘，到了距老家几千里之外的城市后，不知不觉中，记忆生出万里长的触角，那触角一路匍匐，回到老家，回到我遗忘在老井附近的石头上，回到父亲栽种的槐树杈间，荡来荡去。

我不知道，这些隐形的触角哪来的力量，一路牵引，将我一遍又一遍陷入回忆，使我想要突破的边界越来越缩小。

因此，我只好在我熟悉的地盘成为一个游行者。这下，我发现了那几个人的变化。三兄弟已经在小城买了楼房，七斤叔盖了新房，虽然很小，但檐下也是窗明几净。马夫有了他的第一辆新摩托车，看护着他哥遗留的十多匹矮马。

秋末，我与三兄弟在青草地上相遇。他们在割草，20多年前，我也用镰刀收过秋草。眼下，他们用工割草机，割草机的轰鸣声显得很欢畅。不到半天工夫就将一大片青草卧倒。第二日，我们杀羊。三人不停地忙碌着，却一言不发。一个个像是会移动的雕塑，偶尔冲着你投来一抹笑。那笑也很短暂，没等你回应，便消失了。

安静极了，与四周的原野地一样，没有一丝多余的声响。就连马夫的那几匹马，远远地伫立在草地上，一动不动地望着你，不肯发出一腔嘶鸣。

我想，文学创作，就是营造这样的安静。就像是躲进地下酒窖，浸在沁心酒香间，任血液放慢流淌的速度。这种感觉，就是我想在创作中表达的。对于我来讲，表达一种感觉，哪怕这种感觉只存于一瞬间，我也会尽力捕捉。

竟更熟悉、更有把握，文章也更充裕些，便先辑成了这本回族文学评论集。在我看来，比较小众、比较边缘于主流视域的回族文学研究并不是一个封闭在空调房里、依据文献就可以随意发言的事业，而是一个多维度的、时刻处于运动状态的、到处布满活性元素的事业：作家口述史采集、图书与民间档案的收集保护、文学作品的影视转化、约组书稿、编选读本、策划评奖、主编微信号……凡此种种，都是文学振兴基业中不可割裂的肌体。愈是密切地投身于公益性的社会事业，愈对回族文学有了相濡以沫的感情，有了切肤的理解，有了向外界传达真相、读解内里、修正差误、推举榜样，为时代留下一抹记录的愿望，于是评论也就成了释放这些需求的必要通孔。有时遇到迫不及待的表达需要，再牵肠挂肚的创作也得为评论让让道。我总觉得，就民族文学的整体生态来看，创作上比我更有水准和值者大有人在，而寡清得多的评论，常常真是处于你不吱喝便无人问津的窘境。

我深深自知，得以入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且是10部作品中唯一的评论集，很可能并非主要缘于文本质地，而是更多基于文字背后潜伏的精神和姿态，是对我自身处的青年群体在喧哗拷问中献身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事业的一种鼓舞。这本书更像一部散论的集成，而不像一部为问题意识而生、由特定主题发凡的“专著”。或许可以换成我更喜欢的

少数民族文艺

朝颜



文学视角下的庭审

尹汉胤

坦率地说，阅读朝颜的纪实散文《陪审员手记》，是个令人心情压抑的阅读过程。其感觉就像是将一个个疮疤残忍地扒开，分毫毕现地呈现在你眼前。相信作为人民陪审员的朝颜，坐在审判厅中面对着一个个冷漠的面孔、扭曲的人性，聆听着颤覆的亲情、背叛的婚姻……心中一定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被各种案例深深触痛着。难能可贵的是，朝颜没有端坐在陪审员位置上，以冷静的旁观者完成自己的职责。而是以作家的强烈责任感，全身心地投入到案件的审判中，以文学的视角，通过深入细致的观察，走入每一位庭审当事人的内心，追根溯源地探究着他们的心理。几年中，朝颜锲而不舍地奔波在法庭、监狱，追踪寻访着当事人以及没有出庭的各种关系人，在掌握了大量案例事实以及当事人生活细节的基础上，完成了这部凝结着作者心力，对当下社会生活具有启示意义的纪实散文。

据朝颜讲，成为人民陪审员的最初缘起，是十几年前购买了一套法学高考教材，准备参加成人考试，以获得法学本科学历成为一名律师。后因种种原因，这一人生目标没能实现，但希望成为一名律师的梦想，却在她心里潜滋暗长。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被瑞金市人民法院推荐为人民陪审员，担任这一社会职责使她以另一种形式坐在法庭中实现了多年的“梦想”。

然而，当朝颜亲身坐在庄严的法庭，近距离聆听着法官对案件的庭审时，活生生的种种案例、各种丑恶卑鄙的灵魂、触目惊心的犯罪事实，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在经历了多场庭审，目睹了愤怒、无奈、悲哀、悔恨……众多面孔后，使她清晰深刻地看到了社会肌理的病灶，油然而生的强烈使命感，促使她重新定位了自己人民陪审员的角色。她决定以纪实文学的形式，在客观记录案例事实的同时，对案中各种人物的人性成因、变态心理进行一次文学的剖析，以呈现出他们的心路历程。然而，当她动笔写作

今年花胜去年红

包明德

郁达夫曾说，北京春天最值得记忆的痕迹，是城厢内外的那一层新绿，洪水似的新绿。我相继参加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的评审会和改稿会，突出的感受是今年花胜去年红。阅读这些作品所激起的感奋与欣喜，是2019年春天之深刻美好的记忆。

入选丛书的小说集《七角羊》，共收入《神的水槽》《热恋中的巴岱》《背石头的女人》《草地女人》和《七角羊》等14篇作品。作者娜仁高娃以诗情画意的笔触，通过精巧构思、叙事与描写，刻画了诺明嘎尔玛、艾琳戈、阿云达日玛、巴岱和吉格米德等众多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这些形象映现了草原特定人群的本真、朴实、勤劳、善良与温情。同时，通过他们呈现出奇异的风景、风俗、情境、意象，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文学的生命力、影响力是恒久的，是图像、网络永远不能替代的，因为文学的突出特征主要表现在语言、细节以及心理描写的精彩上面。娜仁高娃这部作品集的文学主体性或审美自律性，正是体现于这些方面。例如，“雨好像懂得沙窝子地的焦渴，把水豆儿直直地往沙丘上砸，砸出无数个小眼来”。“吉格米德的大鹭，像是羽翼乱了的大鸟在草丛间摇摆”。“三个孩子的头发湿湿地贴着脑勺，露出三双大大的耳朵来”（《草地女人》）。再如《热恋中的巴岱》，他第一次受到女人的亲吻，“没想到女人的嘴远远比看着时柔润，仿佛不是两片粉朴朴的肉——而是滚烫的、乱颤的豆腐脑”。在《背石头的女人》中，作品从石头的视角显现男女的差异，细腻而生动：“女人后背出汗了，没生出水珠儿，只在衬衫上洩出一圈水印来”。等等。

娜仁高娃出生于鄂尔多斯库布其沙漠的腹地。从童年时代起，她通过听民间故事、家族故事和过往传说，通过自己的体验观察，积累起丰厚的素材，激发了创作的才情。她对素材的过滤、提炼与选择颇为精当，情节结构的设计与人物塑造上也独具匠心。她蒙汉兼通，善于从传

寻找一种新的批评方法

孟繁华

实事求是地说，石彦伟这本批评集的书名是我建议的。他原来有自己命名的书名，但我觉得不那么确切，也不大醒目，于是我便建议他用了这个书名。这样的做法很容易让人想起孟子批评的“好为人师”的“人忌之”。好在石彦伟年轻，他没有计较地接纳了。这个书名自然与石彦伟批评文集的内容有关，他几乎是研究回族文学的专门家；另一方面，我也是受到了美国人类学大师克利弗德·纪尔兹（格尔兹）的名著《地方知识》的影响和启示。纪尔兹的巨著《文化的诠释》出版以来，是学界重要的阅读著作，《地方知识》是继《文化的诠释》之后的另一本重要著作。这本书不同于《文化的诠释》。《文化的诠释》提出了“深描说”，那是一种“迈向文化的解释理论”；《地方知识》更像一本文艺评论集，收录了包括《文类的混淆》《在翻译中发现》《艺术乃一文化体系》《地方知识》等8篇短论文，它不仅显示了纪尔兹的博学，同时也是一种深具文学性的写作。

石彦伟的这本文集，大多是研究和评论回族文学的文章。既有《回族文学》的年度述评，也有“回族文学”的年度述评；既有对张承志、雷达这样当代著名回族作家的评论，也有对像石舒清、马金莲、李进祥等著名的青年作家的评论；更有对不同地区回族文学的观照和评论。有点有面，有宏观也有具体，从中可以窥见石彦伟从事文学评论以来的大体样貌。石彦伟是“80后”一代年轻的批评家，他有这代批评家共同的阅历和经验，有这代批评家大体相似的学院经历和知识背景。但是，由于他关注的文学对象的差异性，使得他的文学批评与同代人比较还是有较大的辨识度和特点。我想大概可以归纳这样几点：

首先是石彦伟“与文明对话”中的宽阔的文学视野。他在通过一个时段回族文学的阅读和勘探，看到了“‘后心灵史时代’的回族长篇小说处于领袖缺席状态”的扭

时才发现，这绝非是一次轻松的写作实践。写作中她才体会到，写作这部作品的过程，不仅是对作者人性道德的检验，同时也是对其身心承受力的一次考验。

当今中国，正处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历史阶段，伴随着新时代生活的巨大变化，原有的传统观念、生活形态都在发生着嬗变。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社会阶段中，充分暴露出了社会道德严重缺失的问题。阅读朝颜的《陪审员手记》，深刻体会到了她在写作这部作品时内心时时遭际着困惑、痛苦的心理折磨。然而令人钦佩的是她没有退缩，而是以作家的良知和文学坚守完成了这部作品。

而在《飘萍》一文中，朝颜进一步写出了中国的特有现象——大量的农村年轻人涌向城市打工。当新春来临时，许多小伙子会领着一个外地女子回乡。这些女子之所以来到陌生的异乡，无一例外心中都坚信着爱情的力量。然而当生儿育女后，许多青年男女又会各奔东西不知所踪。而那些由不确定婚姻生出的孩子，一出生便不见父母面。朝颜在文中特别列举了美国学者哈洛的一个实验：将刚出生的一群小猴子从父母身边带离，强行关入一个笼子。在隔绝父母环境中长大后，小猴子无一例外的都无法融入族群，它们就像是得了精神病般尖叫、哭泣、害怕、抗拒……对此，朝颜振聋发聩地写道：“强加于孩子身上的不公，总有一天，他们会用不同的方式还给世界。如果这些被不幸婚姻牺牲的孩子长大后，全都重蹈了父母的覆辙，周而复始，恶性循环，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庭审对于婚姻只是一次法律判决，而对于那些孩子来说，却是笼罩在人生阴影中度过终生。我深为朝颜负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写下的这部作品点赞。

文学在给予人类美好憧憬的同时，责无旁贷地还肩负着呼唤人类灵魂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阅读朝颜的《审判员手记》，便弥足珍贵地显示出了一种文学价值。

统、从民间、从现实生活学习和积累语言，在创作中锤炼打磨，精巧运用。这对于提升她创作的文学品位显现了卓越的功效。

作者创作要精益求精，精雕细刻，读者欣赏要细读作品，精读作品。但是，这和“新批评派”关于精读细读的指涉是有差异的。语言是作者与读者、与社会、与人生沟通交流的中介。精雕细刻，精读细读，不是室抑沉缅，而是跳出文本，走向诗意的远方，与时代、与人生、与心灵对话。

“我想多痛哭一场，然而我觉得这颗心，比沙漠还要干燥。”这段话是安德烈·纪德在他的作品《田园交响曲》篇末所说的。这是很有反思精神与警策意味的金玉良言。娜仁高娃的悟性很强，善于学习，勤于探索，勇于求新。她把4月22日从书改稿会上专家的指导意见全部录了音，返乡后进行认真地学习与领悟。她意识到自己老是在重复一个内容，就是沙窝子地的故事。她还深有感触地说：“我试着直面当下地写一些，可总是找不到切入点。想越过去自己，好难”。娜仁高娃把问题说到点上啦。文学的民族性不是凝固的抽象物，不是静态的符号，也不是孤芳自赏的藩篱，而是继续前行的依托与起点。民族审美内涵的创新性、丰富性与深刻性，离不开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离不开外界信息与语义的碰撞和影响。我国有杰出成就的各民族作家有一个共同的经验，就是必须扩展文学视野，只有放开眼界审视民族生活与本土文化，才能开辟出更加广阔的文学天地。只有超越自己，才能提升自己。作为一位优秀作家，只有把自己的积累、对往昔的回忆与对现实的关注思考结合起来，把民族性本土性书写与家国情怀乃至人类意识结合起来，才能放飞审美想象，使之在学习、互鉴和启迪中升华，从而使自己的创作实现创新，并不断向着经典化的方向拓展。

石彦伟，回族，1985年生于哈尔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北京。《民族文学》杂志编辑，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文学、影视与口述历史。出版散文集《面朝活水》《雕花的门》《泰斯比哈》，部分作品被译为阿拉伯文、维吾尔文、蒙古文，入选多种选本。曾获冰心散文奖、黑龙江省少数民族文学奖、《民族文学》年度奖、《广西文学》年度奖等。评论集《地方知识与边缘经验》入选“2018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

不知这话当讲不当讲，与评论相比，我还是对创作更为迷恋。如果硬让我把研究扔下，一辈子只能去干创作这件事，我兴许是能够许可的；但若是反过来，一辈子只能搞评论，不让我创作了，我是死也不会答应。这当然只是一个不具有可能性的假设，二者都能兼顾很好的人，已有太多先例。只是不乏矫情地觉得，对钟情创作的人来说，付出相当一部分精力用于评论写作，确实需要一种莫名其妙的使命感来支撑。像是荒野里的草籽，这使命感起初是埋没的，荒芜的，但写着写着，就从大地深处钻出了脑袋，渐渐变得挺拔了、旺盛了，最后是野火烧也烧不尽了。

我对回族文学的研究，大体属于这样一种描述。记得中学时代，读过《穆斯林的葬礼》后，我用了一个月时间，每天放学就打开电脑敲上一段，就这么敲出一万多字的读书笔记。那时可不知何为“文本细读”，何为“复调”，甚至不曾接触互联网，无任何文献渠道，只是凭着一股较劲儿，把自己的感受本能地倾吐出来。这次成书，冒着被鄙视的危险，我把这篇习作也收进了进来。那实在算不得什么评论，却是一颗挂在树梢上的再难寻回的心。

除此一篇之外，本所收篇章都是2008年我到《民族文学》当编辑后所写。这份职业提示着我以公正、通达的心去追求包容，远离狭隘，各民族的多元文学都是我内心里极为挚爱、时刻注意学习的，我也写过一些兄弟民族作家的评论。只不过，精力使然，能力所囿，写得不够多。对本民族的文学毕

创作与使命感

石彦伟



石彦伟

转，看到了回族作家作品的不断丰富和作家队伍的不断壮大。“回族文学”的边界在不断拓展和深入的现实。他不回避问题，但总体上他不是当代文学的“唱衰派”。通过对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网络文学等不同文学样式的具体分析，他看到了变化和发展，看到了新的局面和气象。

其次，是石彦伟文学批评的格局和气象。对一个青年批评家来说，写具体的作家论和作品论可能更驾轻就熟，他们基本的文学批评训练决定了这一点。但是石彦伟对当下回族文学总体性的把握和了解，使他敢于、也有能力写出“大文章”。他的“年度评述”是一种类型，他写出了多篇像《回族文学的“抗战动作”》这样的文章，不仅需要文学史知识，同时更要具备从学术意义上讨论这一现象的能力。这是一篇重新“发现边缘”的文章，如果没有良好的学术训练，写出这样的文章是不可能的。他在“时间与空间”不同的维度上努力驰骋，看到了回族文学在不同历史和地域中的绚丽绽放。

第三，是石彦伟对艺术问题的精确分析，对文本细读的耐心和诚恳。他写了大量的作家作品评论。这类文章是批评家的基本功，要求批评家有良好的艺术感觉和理论修养。石彦伟在评论张承志、雷达等著名作家时，体现了正义的文学价值观和良好的文本分析素养；而对那些我还不熟悉作家作品的分析，同样是一种“发现边缘”的工作。这个工作可能是更艰难的——短时段观察，最能考察一个批评家的眼光和功力。

综合石彦伟的文学评论，我认为他是通过文学批评的方式在书写回族的“民族志”，是在寻找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通过“地方性知识”，在寻找知识形成的具体情境和条件。因此也就形成了他关注“地方知识和边缘经验”的合理性。我祝愿年轻的石彦伟的文学评论越来越好。